

高一涵先生年譜

高大同 編著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高一涵先生年谱

八同编著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高一涵先生年谱 / 高大同著. —上海:上海文化出版社,2011. 10
ISBN 978-7-80740-754-6

I. ①高... II. ①高... III. ①高一涵(1885~1968)
—年谱 IV. ①K827=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85495 号

出版人

王 刚

责任编辑

王 珺

装帧设计

方 明

书名

高一涵先生年谱

出版、发行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网址:www.shwenyi.com

印刷

上海市印刷四厂

开本

890×1240 1/32

印张

9.75

版次

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国际书号

ISBN 978-7-80740-754-6/K·295

定价

28.00 元

告读者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

T: 021-59886521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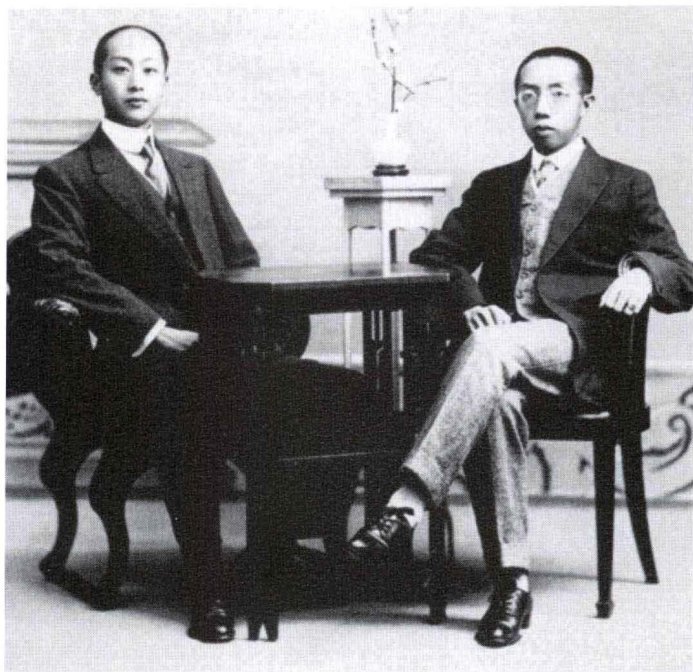
《新青年》编辑高一涵



安徽六安茶叶冲，高一涵少年时曾在此随二兄读私塾



安徽六安高家祠堂现为高祠小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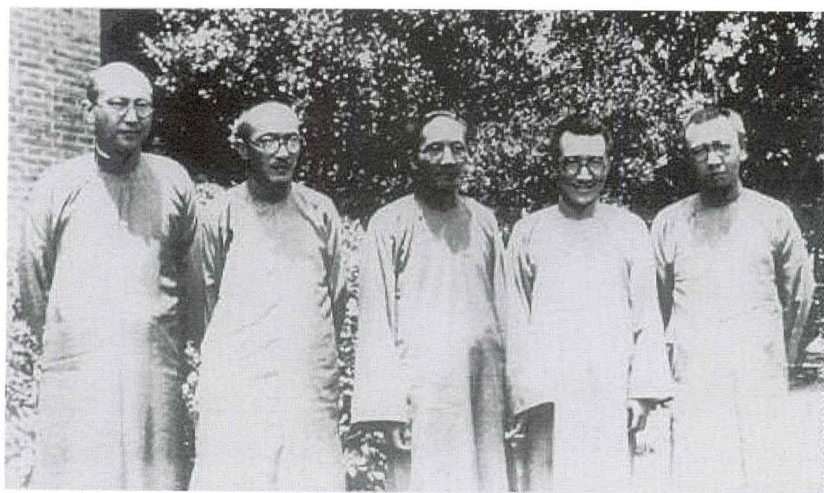
1915 年高一涵与许怡荪在日本东京合影



《宪法公言》社同人合影（后排左一为高一涵，前排中为李大钊）



《新青年》主要撰稿人：陈独秀、胡 适、李大钊、鲁 迅、钱玄同
刘半农、周作人、沈尹默、高一涵、陶孟和



高一涵、马君武、蔡元培、胡适、丁毅音在中国公学合影



高一涵与夫人陈廷祺在南京莫干山路三号家门前合影

序 言

——走近高一涵

高一涵——这是一个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绕不过去的人物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由于种种原因，他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，留给人们一个模糊的背影。然而，他又与陈独秀、李大钊、胡适、王星拱、蔡元培、章士钊、于右任、邵飘萍、张大千、鲁迅、许怡荪、高语罕、刘希平、朱蕴山……这一系列的名字联在一起，和他们有着深深的交集。提到他们、研究他们，就绕不过高一涵这个名字。

打开 20 世纪初，那些被人们追逐、争相传阅的报纸杂志，如：《甲寅月刊》、《新青年》、《每周评论》、《努力周报》、《甲寅日报》、《晨报》、《现代评论》、《东方杂志》、《晨光》、《新生活》、《北大社会科学季刊》……署名高一涵、一涵、涵、涵庐的文章比比皆是，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，都堪列前茅。他无可辩驳的是那个年代思想启蒙的一员战将，一个为新文化运动冲锋陷阵、摇旗呐喊的斗士。

然而，自 1930 年后他逐渐淡出学界、报刊、论坛，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也极少被学者所关注和研究。据徐州师范大学吴汉全教授的统计，在 1999 年张春丽发表《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中高一涵启蒙思想初探》之前，尚未有学者专门研究过高一涵。而在同一年，研究五四时期的其他历史人物的论文有：李大钊 65 篇、胡适 83 篇、陈独秀 74 篇、鲁迅 405 篇、蔡元培 42 篇。直至今日，研究高一涵的专著还是了了。

带着疑问，带着对历史和对前辈的尊重，我自 2003 年起，开

始了走近高一涵的历程。

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、江苏省、甘肃省、湖南省、湖北省档案馆、上海市、芷江市档案馆；在上海图书馆、南京图书馆、国家图书馆、甘肃省、湖南省、湖北省图书馆……在茫茫的书海中、在泛黄的档案资料和报刊杂志中，搜寻着有关高一涵的只字片语。

借助于网络，一遍又一遍地对高一涵的名字进行搜索，一万多条信息，被翻来覆去地搜了几遍，从中搜寻着线索、搜寻着故事，搜寻着高一涵的文章、书信，搜寻着对高一涵的研究论文。

翻阅着一系列名人的年谱、传记、日记、文集，查寻着高一涵与他们的交集，他们思想上的共鸣点，他们的友谊和分歧，作为那个时代最先进的一批知识分子，在黑暗中为探索中华崛起民富国强的路，各自所作的种种努力和各自的人生之路。

沿着高一涵的人生足迹，从安徽六安东河口镇的故居，到六安、安庆，到北京、上海、南京、武汉、长沙、芷江、兰州……再回到南京，在他最后工作过的江苏省政协、江苏省民盟，在他最后居住的莫干山路三号的旧居，一路走来，体验他人生的艰难、他的探索、他的思考、他的奋斗、他的无奈和他在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喜悦、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焦虑、迷茫。他跌宕起伏多侧面的人生，本身就是一本耐人寻味的书，给人以启迪和思考……。

八年来收集到的高一涵著述有 310 篇，高一涵提交监察院的弹劾文 96 份、审查报告书 35 份，诗 383 首，来往书信手迹（影印件）42 封，亲笔信 2 封，墨宝（影印件）26 幅，照片 6 张，家族宗谱一份（计 33 卷 37 册）……研究高一涵的论文与专著 28 篇，还有众多刊载高一涵文章和活动的各类期刊报纸……。

透过这些，高一涵一步步向我们走近：

1885 年 4 月 4 日（清光绪乙酉十一年二月十九日卯时），高一涵出生在安徽六安官亭保田埠榜张家湾庄（一个山清水秀的小山庄）。“书香门第”和高祖高熙爽被尊为“乡贤”的光环，使他从

小就随兄长们苦读“四书五经”，以求榜上有名，尽管他考中了清末秀才，但兄长们在科举制度下消磨毕生精力的惨痛经历，使他对科举制心生痛恨。

1906年初，清废科举后，高一涵进入六安州学堂，1909年被选送考入安徽省高等学堂，在新学堂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梁启超、严复的著作，阅读《民报》、《中国魂》，接受启蒙思想。1907年徐锡麟因刺杀安徽巡抚恩铭，被清廷用剖腹剜心的惨刑处死，高一涵的同乡好友朱蕴山被陪绑法场，这一事件深深刺激着高一涵，激起他对“丧权辱国、腐朽无能、残暴成性的清廷统治的深恶痛绝”，和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与探索。

1912年高一涵远赴日本自费留学，1916年7月，在东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科毕业，获政治学士学位后回国。1919年12月到1920年6月，为编写《欧洲政治思想史》再赴日本。两次留日，高一涵接受了西方政治学、经济学、法律等学科的系统教育，遍寻了当时在日本有关这些领域的西方论著，拓宽了视野，开始形成自己对国家、民权、宪政、自由、民主、人权等一系列理念的独特见解，并在自己的专著和文章中加以阐述，成为那个时代思想启蒙的一颗明星。

1914年到1930年，高一涵以报人和学者的双重身份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。从1914年在《甲寅月刊》上发表文章始，高一涵在新闻界逐渐崭露头角，1915年他作为第二号人物在陈独秀所创办《青年杂志》（第二卷起改名《新青年》）上发表大量文章，迅速被人们认知；此后他又作为《新青年》、《每周评论》、《努力周报》、《甲寅日报》、《宪法公言》、《现代评论》的编辑和重要撰稿人，协助陈独秀、李大钊、胡适、章士钊办报办刊，是新文化运动发源地北大《一校一刊》的核心人物。在当时许多具有影响力的报纸杂志上，也时时能看到他的文章。

在“五四”爱国主义运动中，他堪称当时新闻界、舆论界最为

活跃的一员，他在《每周评论》、《晨报》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，紧贴时势，痛揭列强侵略本性，抨击当政军阀、政客之无耻、无能，盛赞学生、市民的爱国热忱，批驳对学生的各种非难，强调“但愿我们的国家、我们的法律，顺着正义走”，呼吁“要想废了秘密外交，非从法律上改革不可”。从而激发着青年学生和人民大众奋起抗争的爱国热情和民主意识。他本人也全身心地投入其中，亲自参与陈独秀起草的《北京市民宣言》的印刷和散发，亲身跟随五四学生游行队伍前行：“亲眼看见……这完全是市民的运动，并不单是学生运动。这件事顺着世界新潮流而起，很不可轻易看过。”几十年后，他还为“我在‘五四’运动时，正当年壮，尚能做一个摇旗呐喊的无名小卒。”而自豪。

作为学者，自1918年高一涵由陈独秀介绍进入北大，到1926年底，在北大他先后被聘为编译处编审员、政治学系教授等职，并兼任中国大学、法政学校客座教授。1924年，国共第一次合作后，在李大钊影响下，经石瑛、王星拱介绍，先生加入国民党。

1926年冬，北伐军到达武汉，李大钊力劝高一涵到武汉参加革命工作，次年初，高一涵途经上海时，经高语罕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此后，经陈独秀、章伯钧介绍在武昌中山大学任政治学教授、政治系主任、法科委员会主任委员。同时兼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编译委员，宣传科代科长，安徽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。

1927年，“四一二”、“七一五”事变后，高一涵避居上海。此后，高一涵执教于上海法政大学，并任政治系主任。1928年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后，高一涵应蔡元培、胡适的邀请任中国公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兼本科教授，直至1930年末。

在学界，他自编讲义、潜心著书，先后出版了《欧洲政治思想史》、《中国御史制度的沿革》、《中国内阁制度的沿革》、《政治学纲要》等专著；撰写了大量文章介绍马克思、黑格尔、卢梭、柯尔、罗素、杜威、斯宾塞、弥尔、戴雪、吉野作造、高桥诚一郎

等人的著作与思想，介绍俄国新宪法的根本原理、美国独立时代的政治思想与宪制、英国福宾社会主义派的方法和理论，将西方的先进思想和理念介绍给国人。他特别注重在历史的长河中，去审视对比产生各类国家、制度和各种思潮、思想的土壤，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。他的专著被指定为大学政治学系必读参考书并一版再版；他的文章被选编入国学小丛书、编入国文课本；他的理论、思想被国人知晓。他所论及的有关现代国家理念，现代公民意识，官治、民治、法治、党治，宪政民主，自利利他，自由、民主与法律、道德的关系，对政府官员的监督、监察制度化等等，都有独到的理论建树，时至今日，仍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。

1931年初，高一涵受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的一再邀请，出任国民政府首任监察院委员，开始了他的从政监察生涯。1935年4月——1940年，被任命为国民政府两湖监察使；1940年至1946年，在兰州任甘、宁、青监察使。1947年他再度调任两湖监察使；同年，经监察院提名，当选为国大代表。1948年7月，辞去两湖监察使，后被调任监察院专门委员，不久又辞去专门委员职。

高一涵始终坚持“国家主权在民”这一核心理念，始终关注着对国家权力、政府官员权力的监督和制约，关注五权宪法中监察权如何落实的问题。在长达十几年的监察生涯中，他在理论上不断探索，写出《对于国民大会职权规定的商榷》、《宪法上监察权的问题》、《抗战三年来监察法规增定及推行经过》等文章，积极参与监察法规的制定和修订。在监察实践中，他敢于依法严肃弹劾贪官污吏。仅据《监察院公报》所载，被高一涵弹劾（审查）的人员，上至汪精卫、张学良、王正廷（外交部长），下至贪赃枉法、祸害百姓的县长、法官、税务官，其中仅县长以上的官员就有百人之多。1944年在兰州，高一涵排除干扰，将第八战区司令部兵站总监班淦（中将）贪污公款、贩卖鸦片及其他违禁物品案一一查实，终将其绳之以法。

高一涵一生廉洁自奉，与民同心、为民请命。他曾自订四不规矩：“本监察使绝不受任何方面之供给馈遗；不参加宴会及欢迎会；对于任何机关不作请托介绍书信；凡人民向本署呈递书状，绝不收取任何费用。”并强调：“本署办理案件，惟凭事实为根据，以公正为依归，以期不偏不徇，无枉无纵。”

在其任上适逢 1931 年江苏、1935 湖北特大水灾，他多次亲上防洪一线，勉慰抗洪军民、弹劾贻误赈灾的官员，督办防洪赈灾。为湖北襄堤防洪工程追加五十万款事，他数次上防堤作调查，上书历举在堤民工“日则负土挖坑，形如牛马；夜则幕天席地，饱受风寒”，并非为难供一饱的工钱，而在盼此堤早成能保家园。“此情此景，真为世界万国所无，视察之余，不禁心酸泪下……俯准速筹拨五十万元之款来鄂，……则堤防固而民命亦得保全矣！”此请，很快获国民政府批准拨款。

高一涵还有他作为诗人和书法家的一面。他的诗集《金城集》（1-5 卷），选自其在兰州任上的六百首诗作，他的诗作饱含忧国忧民的深情，格调清新意境幽美，咏物论人都能做到意在双关。在《京沪周刊》、《问世》、《国闻周报》、《本行通讯》、《夏洲世纪》等报刊上，经常有他的诗作发表，他的书法作品也多次被《草书月刊》选登。他曾为张大千、王子云等著名画家的画作题诗题字，作品被多家博物馆所珍藏。他曾陪同于右任考察敦煌，促成于右任向国民政府提出《关于成立敦煌艺术学院，保护敦煌莫高窟》的提案，1943 年 1 月 17 日，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决议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，高一涵被任命为敦煌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，为保护敦煌这一人类文化遗产的瑰宝，做出了自己的努力。

长期的监察生涯，使他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与黑暗，心中渐生退意。1948 年国民党竞选立法委员，六安一些宗亲故旧出为捧场，帮他竞选。他得知后立即从南京发出一份加急电报说：“选余，余不为请托，更不屑请速转爱我诸公立即停止活动”。表示了

退出国民党政坛的决心。1949年4月国民党政府又拟任他为考试院委员，力促他前往台湾，但他坚辞不就，隐居南京。并与民主人士朱子帆（时任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秘书长）、沈子修等为迎接解放而筹划。

南京解放后，高一涵先后任南京大学教授、政治系主任、法学院院长、江苏省司法厅厅长、省政协副主席、省民盟副主委和全国政协委员等职。

目睹新中国建国初期欣欣向荣的景象，高一涵满怀欣喜，一再表示：“要听毛主席的话，跟共产党走，走社会主义道路”。他写信给南官亭乡政府，将其名下祖遗六十亩土地无偿献出；他送自己独子高宗沪参军赴朝；他对新中国的法制建设献计献策，先后发表了《对被告人供词应该怎样正确地评价》、《对于目前婚姻关系变化的分析》、《审判人员能不能向科学进军》、《必须重视和遵守国家法制》等文章，1952年他直言反对撤销南京大学法学院，1957年5月他又旧事重提，提出：马列主义哲学“不能代替政治学、法律学；政府的政策方针也不可以代替法律。”“要巩固人民民主专政，就要加强法制，但谁来订法，现在审理案子，法律条文上没有，有时判错了，有时就无法判案”。为此，他受到批判。在“听、跟、走”的指引下，在焦虑、迷茫和一次次交心、检讨中，渡过了历次政治运动。1966年“文革”爆发，高一涵被点名批判，不久便忧郁成疾，于1968年1月23日病逝于南京家中，享年八十三岁。1978年12月27日，江苏省政协举行高一涵先生骨灰安放仪式，对强加给高一涵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，予以推倒，为其恢复名誉。

八年来，在走近高一涵的过程中，我深深感到：“我们今天遇到的、讨论的、感到困惑的许多思想文化问题，也都是民国时期的人们曾遇到的、讨论的、感到困惑的问题。对民国思想史的研究，能为我们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”（郑大华：《民国思想家论》，载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）。高一涵是